

《全唐诗·牟融集》证伪

陶 敏 刘再华

《全唐诗》卷四六七收牟融诗一卷，诗六十九首，小传云：“牟融，有赠欧阳詹、张籍、韩翃诸人诗，盖贞元、元和间人也。诗一卷。”显然，《全唐诗》的编者并没有掌握牟融生平的任何资料，小传不过就所谓“牟融集”撰写而成。据我们考察，这个《牟融集》实为明人所伪造。

唐代没有牟融其人。我们曾遍搜唐代文献史料，包括史乘笔记、总集别集、政书类书、金石碑志等，从未发现有关唐人牟融的只字片语。苏州大学、河南大学的同志为了编纂《全唐五代诗》，遍阅载籍，制作卡片，也未见由唐至元的典籍中提到牟融和他的诗。从两《唐书》的《经籍》、《艺文》二志到南宋的晁、陈二志以及明初的公私书目，均未见牟融集的著录。唐宋诸唐诗总集选集，明初高棅《唐诗品汇》，明末胡震亨所编以收诗完备著称的《唐音统签》都没有收录牟融诗。那么，《全唐诗》中的这卷牟融诗是从何而来呢？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6年将台湾中央图书馆藏《全唐诗》编者用作底本的季振宜《唐诗》稿本题为《全唐诗稿本》影印出版，牟融诗的来源方公之于世。季氏《全唐诗稿本》第四十七册中，牟融诗是以刻本《牟融诗集》剪贴而成，每页十行、行十八字，左右双栏，白口，版心刻“牟融诗”三字。其版式同南宋书棚本，但实为明正德、嘉靖间陆元大、朱警递辑《唐百家诗集》本，而刻本中《牟融集》则为嘉靖中朱警所补入者（参见《古文献研究集林》第三集贾三强《全唐诗

稿本采用唐集考略》一文，陕西师大出版社，1995年8月）。我们知道，有明一代尊唐之风甚炽，至弘治、正德间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而达高峰。这一时期，书贾们为迎合社会上的需要，牟取利润，大量刊刻唐诗。为求速售，他们往往采用改头换面、鱼目混珠等手法伪造唐人诗集，冒充足本或宋刻出售。如朱警《唐百家诗集》中的《戴叔伦集》二卷，就是据明弘治、正德间刊刻的活字本戴叔伦集刻印，而该集中杂有宋元明各朝人的大量作品，显为明人伪造（参见蒋寅《戴叔伦诗集校注》及该书前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12月）。伪造的戴集尚收集了不少戴叔伦的真作品，而这个牟融集中诗却从未见诸唐宋到明初的文献记载，这不能不是一个最大的疑点。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第五章“史料之搜集与鉴别”中举了十二条“鉴别伪书之公例”，第一条就是：“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，什有九皆伪。”所谓《牟融集》就正是这种情况。

其次，《全唐诗·牟融集》所收诗中提到了一批唐代的人物，如《赠欧阳詹》、《赠杨处厚》、《重赠张籍》、《送徐浩》、《题朱庆余闲居四首》、《赠韩翃》等诗中的徐浩、韩翃、欧阳詹、张籍、杨处厚、朱庆余就都是见于唐代载籍的人物。但如细加考察，便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疑窦。

据《全唐文》卷四四五张式《徐浩神道碑》，浩长安三年（703）生，开元五年（717）明经及第，授鲁山主簿。又据《唐刺史考·河北道·洺州》所考，浩父徐峤之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卒于洺州刺史任。而牟融《赠徐浩》诗称：“知君此去情偏切，堂上椿萱雪满头”，则赠诗时徐浩高堂父母均健在，如牟融其诗不伪，则必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以前。但《牟融集》中又有赠朱庆余诗，庆余宝历二年（826）方登进士第，上距开元二十四年已有九十年。牟融如在开元中与徐浩交游，决不可能至长庆、宝历间又与朱庆余等交游。我们知道，明人伪造唐集的手法之一就是将后

人诗中人名改为唐代人名，例如伪戴叔伦集中收《寄司空曙》、《寄刘禹锡》、《寄孟郊》诸诗乃将明人刘嵩《寄范实夫》、《寄旷伯遼》等诗窜改而成（参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5年第四辑蒋寅《戴叔伦作品考述》、《咸宁师专学报》第十五卷第二期熊飞《戴叔伦诗集校注评介》等），伪殷尧藩集中《寄许浑秀才》七律实即明史谨《秋日述怀次韵》（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独醉亭集》卷中，参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四十七辑陶敏《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辨》），而同题五律实即南宋王柏的《野兴》（见《金华丛书》本《鲁斋王文宪公文集》卷二）。再如伪唐彦谦集中《逢韩喜》、《吊方干处士二首》则是元人戴表元的《逢翁舜咨》、《方处士挽诗二首》（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五十二辑王兆鹏《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》）。牟融集采用的应当是同样的手法，故集中出现了牟融既与开元、天宝中徐浩唱和，又与长庆、宝历中朱庆余交游的大悖常情的现象。岑仲勉先生《读全唐诗札记》中说：“按融有《赠浙西李相公》诗，以其时考之，则德裕也。德裕初守浙西，在长庆二年，未为相，大和八年再除，始在作相之后，诗与题苟均不误者，则融至大和尚存矣。又有《送徐浩》诗，工书之徐浩，卒建中三年，年八十（《旧书》一三七），而此诗尚言椿萱雪满头，必非同人。”岑先生立论是以“诗与题苟均不误”为前提的。如果我们考虑到自唐迄明初牟融及其集从未有人提到或著录的情况，集中的这些矛盾正是集为伪造的证据。

再次，《牟融集》中提到了一批人物，如罗约、李昭训、赵支、殷以道、沈存尚、徐俞、范启东、陈衡、沈翔、张源等，均不见于唐记载籍。就中送范启东二诗最可注意，抄录如下：

送范启东还京

萧萧行李上征鞍，满目离情欲去难。
客里故人尊酒别，天涯游子弊裘寒。
官桥杨柳和愁折，驿路梅花带雪看。

重到京华旧游处，春风佳丽好盘桓。

送范启东

杨柳春江上，东风一棹轻。

行囊归客兴，尊酒故人情。

画史名当代，声华重两京。

临岐分手处，无奈别离生。

据诗，范启东是一位名画家，但唐代并无其人。相反，在明代却有一个名叫范暹字启东的画家。叶盛《水东日记》卷四记载：

“范启东闻之前辈云：‘士大夫游艺必审轻重，且当先有迹者。谓学文胜学诗，学诗胜学书，学书胜学图画，此可以垂名，可以法后。若琴奕，犹不失为清士，舍此则末技矣。启东盖善花鸟，有谈论，馆阁名公多重之。老于京师，人称范苇斋先生云。”徐沁《明画录》卷六云：“范暹，字启东，号苇斋，吴县人，工书法。永乐中，征入画院，善花竹翎毛，笔致俊逸。叶文庄公慎许可，常言起东善花鸟，有谈论，馆阁争相器重。”《明诗纪事》乙签卷八王直亦有《题范启东秋江捕鱼图》诗。王直为永乐甲申（1404）进士，与范启东同时。叶盛明正统十年（1445）进士，后官至吏部左侍郎，《明史》有传。他得接范启东之交游，称范“老于京师”，则范之年齿当略长于叶。送范启东二诗为明人作。这是《牟融集》为明人伪造的又一确证。

第四，牟融集中诗尚有经人改窜的明显痕迹，如《过司马迁墓》一诗云：

落落长才负不羁，中原回首益堪悲。

英雄此日谁能荐，声价当时众所推。

一代高风留异国，百年遗迹剩残碑。

经过词客空惆怅，落日寒烟赋黍离。

王国维谓司马迁“卒年虽未可遽知，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，当无大误”（《太史公行年考》），今人多认为卒于征和二年（前91）

后二、三年中，下距玄宗之开元、天宝已八百余年，如果在更晚的贞元、元和中确有牟融而又作诗凭吊他的话，怎能说“百年遗迹”？即使举成数而言，恐怕也应当说“千年遗迹”了。历代的人们对司马迁赞誉有加，但从没有人称他为无人论荐的“英雄”，他也没有如苏武出使之类的“一代高风留异国”的业迹。诗所凭吊的决不是司马迁，而应当是另一个人。大约是因为首句“落落长才负不羁”，和人们熟稔的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中“仆少负不羁之才，长无乡曲之誉”一语相合，便被改题为凭吊司马迁之作。诗称“中原回首益堪悲”，“落日寒烟赋黍离”，作者所处的一定是一个中原板荡、神州陆沉的时代。所以，这首诗决非唐人所作，而只能是南宋人或元人所作。

牟融集中诗多用唐代的人和事，例如《题李昭训山水》末联云：“南州人物依然在，山水幽居胜辋川。”辋川在今陕西兰田县，武后时宋之问于此首创别墅，后王维得而居之，作《辋川集》，其名始彰。《有感二首》其二云：“栖迟未遇常璩荐，邂逅宁弹贡禹冠。”常璩当为常何之误。贞观三年，马周因常何之荐而受知于唐太宗，后官至中书令，事见《旧唐书·马周传》。

《送沈侯之京》云：“刘旻才高能富国，萧何人杰足封侯。”史无刘旻其人，“旻”字亦不协律，当为刘晏之形误。刘晏相代宗，兼领度支、盐铁、转运、租庸等使，善于理财。《旧唐书·刘晏传》史臣评语称晏“通拥滞，任才能，富其国而不劳于民，俭于家而利于众”。我们知道，唐诗中很少用本朝事，更少用本朝人和前朝人作对仗，这里用唐代的常何、刘晏对汉代的贡禹、萧何，显然不类唐人口吻。更何况，诗中还用上了后晋刘昫《旧唐书》中的史臣评语。

此外，牟融诗中还将唐人诗句作为典故使用，如《邵公母》云：“劬劳常想三春恨，思养其如寸草何。”明显是用孟郊《游子吟》中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诗句。再如《楼城叙别》

云：“屈指年华嗟远别，对床风雨话离愁。”按韦应物《示全真元常》云：“宁知风雪（《碧溪诗话》卷六引作“风雨”）夜，复此对床眠。”宋人屡用之，遂成故实（参见《碧溪诗话》卷六）。这种情况出现在据称是“贞元、元和间人”的牟融诗中，显然不合情理。集中又有《翁母些》诗云：“满头华发向人垂，长逝音容迥莫追。先垄每怀风木夜，画堂无复彩衣时。停车遥望孤云影，翘首惊看吊鹤悲。独有贤人崇孝义，伤心共咏蓼莪诗。”这是一首挽诗。《楚辞·招魂》：“魂兮归来，……何为四方些。”洪兴祖补注：“些，苏贺切。《说文》云，语词也。沈存中云：今夔峡湖湘及南北间獠人，凡禁咒语尾皆称些，乃楚人旧俗。”可见诗中的“些”是作为挽歌的代用语来使用的。这种用法始于何时还有待查考，但可以断言的是，这在唐诗中是绝对找不到例证的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断定，这个牟融集并不是唐人诗集，而是后人所伪造。不过，我们虽然查阅了元至明初的大量别集，还没有找到这些诗的真正作者。最后还应指出，虽然唐代没有牟融这个人，但作伪者将这个伪集置于牟融名下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下》道家部中有“《牟子》二卷，牟融撰”列，于南齐萧子良撰《净住子》二十卷前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三》则将牟融《牟子》二卷列于傅奕注《老子》二卷前。大约作伪者见傅奕是唐高祖时著名的反佛人物，以为其前的牟融也是唐初人，就把这个伪造的诗集归到了他的名下。其实，只要略加查考，就可发现，《隋书·经籍志三》已著录：“《牟子》二卷，后汉太尉牟融撰。”而这位牟融在《后汉书》卷二六中有传，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，汉章帝时官至太尉。《牟融集》所伪托的牟融竟是东汉人，这大约是作伪者始料所不及的吧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南湘潭师范学院北院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